

# 与海贸打交道之官私机构的深度解读 ——陈国栋《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评介

王日根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0-422X(2014)04-0106-03

DOI:10.13469/j.cnki.zgshijisj.2014.04.013

陈国栋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随曹永和先生研究海洋史,最先接触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奏折,参与完成军机处录副奏折的整理,因而具备了推进前人有关粤海关与十三行的既有研究的条件。2014年9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陈国栋先生的《清代前期的粤海关与十三行》,该书由周惊涛任责任编辑,共40万字,堪称是近年来该领域的一部上佳之作。

## 一、最早利用中外原始档案研究粤海关和十三行并多有新见

正因为作者从原始档案出发,故路径坚实正确,新见具有扎实的依据。这些新见散见于书的许多章节:(一)既往研究多强调粤海关的贪腐,其实,贪腐现象多受到抑制,以粤海关监督的人事背景与个人行为为例,从乾隆十五年(1750)开始,粤海关监督专由内务府司官(郎中、员外郎、主事)一级的包衣(内务府包衣也就是皇帝的奴仆)担任。经此安排,皇帝既从亲信中择人出任,又易于掌握他们的财产变化,遇有贪腐,很容易被发觉,并及时切断其贪腐链。(二)粤海关的收入并没有多大比例进入包衣或内务府手中,而是大量被起解户部充实着清朝的国库。在乾隆年间以前,甚至有内务府经常将用剩的经费拨给户部应用,与清末的情况迥然不同。(三)作者从英国剑桥大学所藏粤海关出口关票——红单与红单船中看到粤海关不仅只处理外国人贸易事务,而且在管理

本国沿海贸易方面亦有所作为。(四)1984年作者赴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虽继续从事广东行商的老课题研究,但史料阅读的范围却大大地拓展了。他跑遍了康奈尔大学、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伦敦印度办公室图书档案馆等,阅读到了马戛尔尼文书、美国对华贸易商人的书信以及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等专有资料,从而为其进一步深化粤海关与十三行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者发现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2—1826年85年中设在广州的荷兰商馆档案,丰富了对包括英国、荷兰、瑞典等欧洲人来华贸易的认识,英国人无疑是在广州最有势力的欧洲商人,他们在广州的各种公开的、秘密的会议记录,与中国官府及行商往来的文件均由作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挖掘出来。其中的外交部档案让作者的博士论文具备了扎实的史料基础,进而讨论了广州外国贸易的架构、广州贸易的获利机会、行商利润的去向、行商的财务窘境、政府、民间与外国机构为此所作的努力等。

作者对行商的关注除了怡和行的伍家、同文行的潘家之外,还特别挑选了36家在1760—1843年间因为破产等因素而离开行业的行商,这种兼顾成功者和失败者的研究路数因为其全面性的追求,值得充分肯定。

作者将对成功者和失败者的探究落实到个案研究上,譬如《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旧中国贸易中的不确定

[收稿日期] 2014-10-12

• 106 •

性——广东洋行福隆行的个案研究》与《广东行商中和的破产——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与清代奏折》等文章均追溯到海关监督的来龙去脉,其既与八旗制度相联系,也与盐政、织造等相承接。

作者在对粤海关与十三行的深度探究中,提出了自己的深刻认识。作者指出为许多学者所认同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限令广州一口通商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作者认为:鸦片战争以前不只外国人可以到中国贸易,本国人也可以合法请领执照,前往日本及东南亚等处做生意,江苏、浙江、福建与广东都开放人民出海,前往外国,每个省份都有不只一处的开放港口。说“广州独口贸易”只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针对英国人试图在广州以北打开其他口岸的贸易而作出的对策,只是适用于英国人,是中国传统外交管理体制的一种延续,即一国一港的基本原则。如俄罗斯在恰克图、琉球在福建、暹罗在广东、越南在广西、南掌、缅甸在云南,这些针对属国的管理机制却不能被英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西方国家随意打破。

作者剖析潘有度于1788年到1820年间在广州贸易历经重大变迁、全体洋商遭遇来自官方强大需索却顺利而成功地发展事业与积累巨额财富的历程。

## 二、作者对若干概念、称呼的考订令人信服

本书的第一篇是“粤海关监督的派遣”,海关是天子的钱库之一,谁来执掌在皇帝看来是非同小可的事,动用自己身边的人就非常自然。在普通的老百姓那里,海关监督代表皇帝权威,是皇帝的家人,闽南语发音叫“包衣”(Booi),闽南商人这么叫了,当地的百姓也跟随之,甚至外国商人也如此称呼,或叫“Poe”,或叫“Boee”,后来有的老百姓干脆连一般的政府官员都叫成“包衣”,颇像后来流行的“长官”一样。本来包衣是皇帝内府的家人,也即“家生子儿”,属于家佣一类。但他们进入官场,就成了显赫的一群了。

作者研究制度史,特别擅长追究制度名称的由来、制度变迁的脉络和制度运行中遭遇的

实际情况。在研究到粤海关的行政体系时,作者先清晰勾勒“粤海关是南京条约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它的首长即粤海关监督。”前一章已描述过粤海关监督设置、选拔对象、作用及其与皇帝的关系,这些因素直接决定了粤海关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以及皇帝愿意赋予给粤海关的权力大小。粤海关下设75个子口,按照功能可区分为“正税之口”、“挂号之口”与“稽查之口”,其中“挂号”与“正税”两种口岸分别提供报关登记、填写税单与收受关税的功能,因此又合称为“收税口岸”,“稽查之口”则仅负责船只、货物出入的稽查,当时有正税之口31个,挂号之口和稽查之口分别为22个。从行政隶属做划分则区分为“总口”与“小口”。

作者描述各具体口岸时,力求将其个性彰显出来,譬如澳门口岸既是葡萄牙人的居住地,也是葡萄牙人向广州进行贸易的据点,但澳门同时还是欧洲各国人的一个据点。再譬如,琼州即海南岛,设有海南行,但十七世纪末年的欧洲人曾说海南岛“虽然隶属于中国皇帝,不得云为外国,然而中国商人本身却将此地视为异域。”或许这主要是从地理因素方面着眼而已,因为清政府了解到琼州的海岸线很长,而且向南前往东南亚贸易不必经过广州,管理上较棘手,因此粤海关在此设置了十个子口,并且都是“正税之口”。潮州打通了广东与福建间的海上贸易通道,运行于此间的船只则被称为“福潮船”。

说到海关监督的设置曾经历了雍正元年至乾隆十五年废置不定和乾隆十五年至道光二十二年监督职责逐渐明确两个时期。

关于粤海关的行政组织有笔帖式、委员与杂职、胥吏、家人、长随与差役等,在胥吏之中,有中央的“科”和地方的“房”,清代之吏还可做“京吏”与“外吏”的区别,外吏还可分为书吏、承差、典吏与攒典。总体看,粤海关是一个专业性的衙门,专管广东省沿海等处贸易税务。

落实到税册上,陈国栋先生指出包含亲填册、循环册、稽考册三种,税则则时常有变化,以致有些外国商人抱怨不知道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税率,船钞制自明代便推行于广东市舶司,船只大小是基本的征收依据,除此之外,有货

税,依据正税、比例、估价例、规例来加以实施。粤海关关税收入的去向通过奏折可归纳为(1)采办贡品,传办方物;(2)通关经费,在关养廉;(3)解部饭银;(4)解饷水脚;(5)镕销折耗。关税盈余如何起解、留贮、指拨和截拨,这些具体的细节真是特别复杂,陈国栋先生都娓娓道来,让人豁然开朗。

关于粤海关的利益分配,涉及到监督、内务府、户部、包衣这些不同的方面,粤海关的收入以交给户部支配的比例为最大,监督虽然身隶内务府,但内务府所得甚少,监督无法自由使用关税收入,往往由上级衙门乃至皇帝花销一空,自己落不到多大好处。陈国栋先生凭借较深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能刨根究底的扎实功力,将若干制度层面的内容具体化、形象化,在这些方面,陈国栋先生确实独擅其长。

还有以往普遍认为1771—1843年间广州存在“公行制度”亦经不起推敲,事实上“公行”只行于两个时期,第一次是1720年,次年便解散了。第二次是1760年,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操纵运作,11年后的乾隆三十五年年底(1771年初)废止,此后不再复设,即“公行”并未成为稳定的、覆盖全体行商组织的公行。

在“洋行”之中,作者区分“外洋行”、“内洋行”,“外洋行”中有“外洋行会馆”(也称为“外洋行公所”),通过收取“行用”(西方文献称为“公所基金”),以应付政府强施在他们身上的共同责任。

作者还认为:历史上的“大班”一词本来指的是非常有实力的资本家,1779年以后特指英国东印度公所“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这个特别委员会由四、五名资深管货人组成,因此在大班之下则依次序排列出“二班”、“三班”、“四班”等等。但是后来大班的概念出现了泛化现象,连上海舞厅的领班也被称为“大班”,这是需要甄别对待的。

### 三、延伸课题研究的意义

陈国栋将《内务府官员的外派、外任与乾隆宫廷文物供给之间的关系》、《乾隆年间的粤海关与内务府》、《清代内务府包衣三旗人员的

分类及其旗下组织——兼论一些有关包衣的问题》、《清代中叶以后重要税差由内务府包衣担任的几点解释》列在全书的第三篇,称作延伸课题。依我的理解,这部分的内容实际上是对第一篇粤海关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别揭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粤海关的高度重视,力图将粤海关的经济利益、秩序稳定和社会治理等都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出清政府尤其是清代皇帝的煞费苦心,还是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譬如作者指出“在皇帝的眼中一般的包衣都小气、下贱、琐碎,可是这种性格却适合办理税差一类的工作(至少不妨碍担任这些工作),并且也适合在本职之外,兼充皇帝的耳目,为皇帝提供一些政治情报。包衣或许免不了贪渎;然而贪渎在政治上原本就是一个麻烦的现象,很难彻底地防患于未然。税差的工作,动辄与银钱的出纳有关,贪渎的事情更加有可能发生。若要根除贪渎,除非取消税差,不收关税、盐税。但是这又不可能办到。在这样的困境下,任用内务府包衣,即使他们与任何人一样也都可能贪渎,可是由于皇帝对包衣财产的变化较易于掌,因此包衣难以完全享有其贪渎之所得。到头来,包衣非法取得的钱财,不是进入户部,就是落入内务府,两者同归于皇帝的支配。皇帝能有效地掌握包衣贪渎得来的金钱,使得帝国的损失降至最小,这也是任用包衣的一项消极的优点。”(第458页)这样的分析入情合理。

总体而言,陈国栋教授坚持以真实、扎实、翔实的历史事实,在许多既有话题上提出了自己若干积极而有建设性的见解,因而作者的实践给学界和社会形成了诸多深刻的启示。

以往我们受到若干偏见影响,或相信中国只是黄土文明,其实中国有悠远的海洋发展史;以往英国人说我们“闭关自守”,其实我们有很大的开放度,有若干个港口的开放;以往多将传统王朝一概看做是开历史倒车的,其实它们推行的若干管理政策至今仍颇有借鉴意义。一切惟西方、惟古代的做法都值得检讨,我们需要的是客观、包容与涵化的宽阔胸襟。